

历史一瞬



武汉第一临时保育院儿童离开武汉转送宜昌入川。



宜昌大撤退时的码头。



民生公司“民安”轮在抗战中功勋卓著。



1942年民生公司“民勤”轮在峡江迎接运士兵。

周末人物 英雄儿女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

1938年10月24日，第一艘满载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。率先登上“生命之舟”的，是一批孤儿难童。卢作孚亲自护送他们进舱。那些可怜的孩子扒在栏杆上挥着小手，齐声高唱：“我们离开了爸爸，我们离开了妈妈，我们失掉了土地，我们失掉了老家……”40天时间，卢作孚带领着他那佩枪炮的“军队”，在敌人的狂轰乱炸中，将拥塞在宜昌的三万人员运走，器材运走三分之二。

卢作孚：1938，长江上的生死接力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入夏后，滚滚长江水裹挟泥沙奔流而下。长江以宜昌为天然分界，上有高山约束，水流湍急；下则平原宽阔，流速甚缓。小城宜昌，在长江北岸，横铺展开。

久坐岸边，江南岸形似金字塔的群山，连绵依旧。本想试图感受1938年卢作孚在此码头上，生死接力，指挥那场惊心动魄的“敦刻尔克大撤退”之场景。然而大江截流后，江面已失去昔日气势，一艘木舟在满是水草的江边悠然游荡。只有在滨江的宜昌大撤退纪念馆里，用“1938”“10”“11”三组数字和铁锚组成的浮雕屹立着，提醒着来往的游客，脚下的土地上，曾有一位大智之人，用他的爱国之心，做了一件不朽之事。

种种方音如鼎沸

今日之宜昌，万民共享山水之和美。而在1938年10月23日，当卢作孚抵达时，眼前的糟糕情形令他大吃一惊——面积仅2平方公里的宜昌古城被人群挤爆了。

“宜昌城人满为患，史无前例。当时仅有10万人口的小县城，流动人口一下子猛增到50万。”原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、宜昌大撤退研究学者朱复胜介绍道，在这场战斗中，途经宜昌入川的人口高达350万。

此时作为“川鄂咽喉”的宜昌，实际上已成为全中国命运的咽喉。平津失守后，日军沿津浦路南下，虽有台儿庄之大捷，激烈战火依旧从淞沪烧至武汉；花园口决堤，黄河改道，满河大水向南扑向千里平川，所到之处，尽成泽国。从长江中下游奔来的难民，如海水倒灌，顺江而上。

工厂内迁也起于战火之中。在上海，有的工厂正在装箱即遭飞机轰炸；有的未及运出，即遇敌军拦截，欲进不得。青岛、南京在来不及运走的情况下，只得把大批工厂烧毁，以免被敌人利用。从武汉到四川，机件或缺乏大型运输工具无法运走，或沉于江中，损失更大。

无论是运人还是运物，“交通”成了战争的另一个主角。1937年9月，时任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临危受命，就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。同年底，他出任国民政府资源、工矿、贸易三委员会联合运输办事处主任，负责调配长江一切公私船只，转运长江中下游入川物资和人员。

可“交通”岂能一夜之间通畅无阻？在宜昌城中，卢作孚看到，旅店、学校、寺庙、教堂里，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爆满。不少人找不到住处，只有露宿街巷、栖身屋檐下。更有投机者，借此囤积之机，租几间房子，门口竖起某某旅社的金字招牌，大揽顾客，莫不生意兴隆。

宜昌城内外人潮涌动，人们所求只是一张入川的船票。1938年10月，在武汉会战即将结束、国民政府即将放弃武汉时，可能西进宜昌的日寇，在大炮飞机的鼓动下，将这股宜昌城内的人潮推向顶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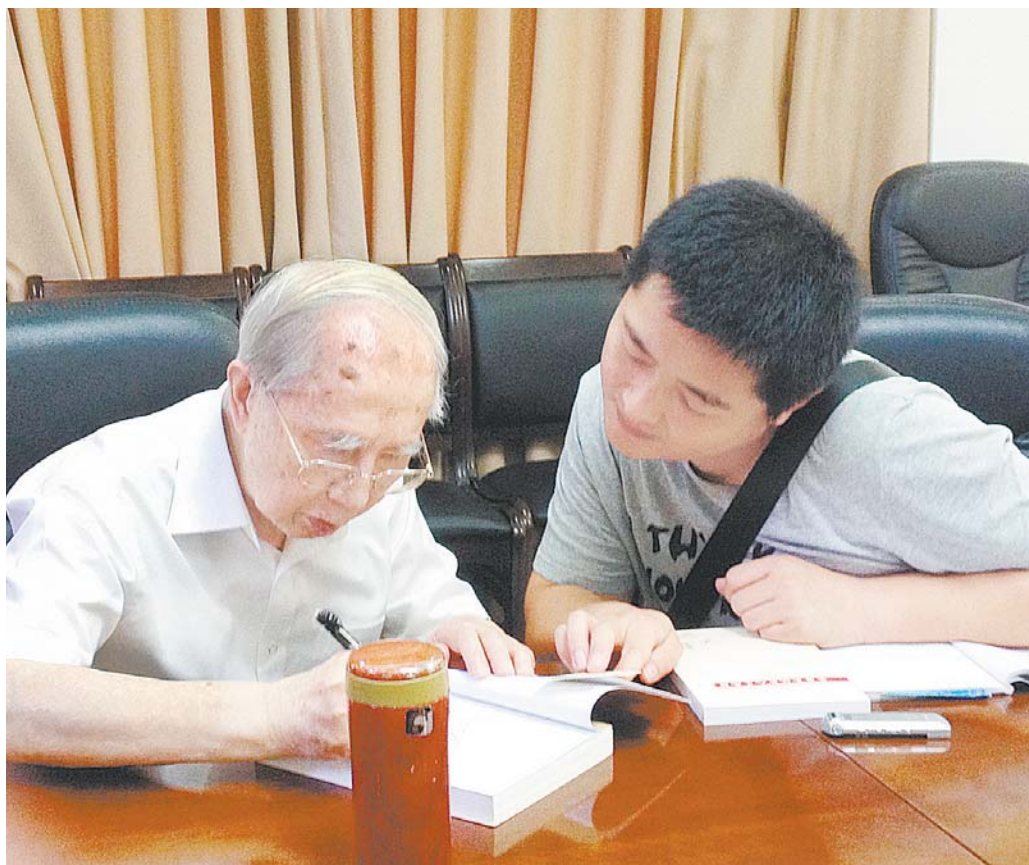
著名作家叶圣陶也在逃难的人群之中，他当时在宜昌苦等7天也没买到船票，而眼前混乱绝望的人潮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面对此情此景，他写下诗句：“种种方音如鼎沸，俱言上水苦无船。”

而和难民一起急需进川的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抢运物资。据民生公司研究室主任项锦熙介绍，民生公司在后来的报告中写道：“二十七年(1938年)十月二十五日，武汉我军退守，宜昌形势，岌岌可危。当时存积宜昌的兵工器材，差不多有十三万吨，必须迅速抢运。”

此外，还有近80家企业的机械制造、化学、电机电器、食品、造船、印刷、纺织等器材、设备，也在武汉会战期间陆续通过轮船和木船运到宜昌，堆积在长江两岸的码头上。卢作孚深知，“全中国的兵工工业、航空工业、重工业、轻工业的生命，完全交付在这里了。”

“可当时能走川江的船只不多，只有民生公司、北北公司、招商局等船队，还有两艘外轮。其中，民生公司的船最多，也只有22艘。宜昌重庆间轮船的总运力，每月不过6000吨。要抢运这十几万吨物资，依当年的运力计算，需要一年的时间。”项锦熙介绍道。

“最要命的是，还有40天左右，长江上游便要进入漫长的枯水期。到时候，装载大型设备的轮船根本无法行驶。也就是说，所有滞留人员和物资必须赶在40天内运完。”朱复胜说道。



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。

运力不足，时间紧迫，到底能怎么办？绝望的情绪，蔓延在宜昌城内的国人心中。

把握四十天，立下“军令状”

宜昌这座慢城的晨间生活，从一碗顺长江漂下来的重庆小面开始。在老街上寻访抗战遗迹，也不甚艰难，用脚步即可丈量的老城里，窄窄的街道两边，两层小楼林立，一如当年的繁华。

在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郑新的带领下，我们看到了那一排幸运的民生公司仓库，是砖头建筑的坡顶平房，看上去比较结实，现在还有单位在使用。

在红星路上的招商局大楼前，绿树掩映中，郑新介绍道：“抗战时，这里是英国太古洋行。这座建筑的隔壁，是我们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，在方方正正的二楼小楼上，卢作孚先生指挥了宜昌大撤退。”

当年的二层小楼只能在旧影像中寻得真容。“红星路一带，在当时是各轮船公司驻地。从大门到每个办公室，挤满了各种交涉的人，管航运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，争运器材的相互责骂，买不到票的难民和倒卖船票的‘黄牛’各不相让。”郑新介绍道。

这吵闹声中，无人有闲暇关心沿江码头上，堆积的10多万吨物资。“装箱的只有极少数，绝大多数无遮无盖、赤裸裸地杂乱堆放在江边的荒地上，日晒雨淋，有些都已生锈。”朱复胜介绍道。

在所有人的头脑都一片混乱的时候，这个时年45岁的小个子、穿麻布服的四川人却保持着清醒。“面对这种混乱局面，我父亲十分镇定。他对那些争吵不休的各单位负责人有礼貌但很坚决地说：请回去，所有的人都明天见！”今年93岁的卢作孚次子卢国纪介绍道。

是夜，卢作孚立即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和各轮船的船长、引水、宜昌港的技术人员连夜开会，制订出在40天内运完撤退物资的详细计划和具体措施。在这次通宵会议上，他参考1936年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，按照40天时间，与诸位同仁设计出一个严密、合理、紧凑的运输计划——

分三段运输，宜昌到三斗坪为第一段，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，万县到重庆为第三段，只有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才直接运往重庆，次要的、较轻的设备，则缩短一半航程，运到奉节、巫山或巴东即卸下，留待以后再转运；船只白天航行，夜间装卸，将运输能力发挥到极限；各单位则清理自己的设备、器材、配套装箱，按轻重缓急，依次分配吨位。

第二天早上，卢作孚将所有在轮船公司吵着要入川的单位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开会，亲自

向大家宣布了自己的运输计划：“请你们放心，我们有充分的把握，在40天的时间内，把拥塞在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！”

此“军令状”似的话语一出，会场内外一片欢腾，不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。

长江上悲壮的交响曲

1938年10月24日，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，开出宜昌港。率先登上“生命之舟”的，是一批由战时儿童保育院(该组织经周恩来、宋庆龄、宋美龄提议建立，在宜昌设有难童接送站)从华北、华东战区抢救出来的无家可归的孤儿难童。

瘦削的卢作孚亲自护送数百名孤儿难童进舱。那些可怜的孩子扒在栏杆上挥着小手，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向卢作孚和他身边的人群告别，齐声唱起了《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》：“我们离开了爸爸，我们离开了妈妈，我们失掉了土地，我们失掉了老家……”

稚嫩的童声盖过周围机器的轰鸣，码头上的人群向他们倾注爱怜的目光，呜咽着挥手与孩子们告别——此情此景，船上船下无不为之动容！

紧张有序的抢运，就此揭开序幕。“从宜昌行船到重庆，全程648公里。当时船队不仅要躲避日机的轰炸袭击，还要在长江三峡里冒险穿越。这一段航道狭窄，滩多水急，洞溪密布，两岸悬崖绝壁，遮天蔽日。礁石林立，滩险密布，光急滩、险滩、浅滩就有158处之多。所以，船队只能在白天航行。”郑新介绍道。

为了争取时间，提高效率，尽量利用夜间装卸。凡要运走的物资，白天早已装在驳船上。傍晚时分，当轮船从上游开回来，快要抵达码头的时候，轮船上的舱口盖子早已揭开，舱门早已拉开，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，拖着驳船的拖轮已经驶近。轮船刚刚抛锚，驳船已经靠到船边，开始紧张地装货了。

今天修缮完的江堤，在当时是漫散的滩涂。夜幕降临时，船上为装货而临时装设的大灯，初夜映在江上，构成一幅壮丽动人的夜景：装卸工人，每数人或数十人为一队，抬着沉重的机器，朝江边走去，不断地喊出有节奏的号子声；拖轮在朦胧的夜色中，来回拖着驳船驰骋在江面上，不断地发出尖厉的汽笛声；轮船上的起重机，在沉重的设备压迫下，不断地发出轧轧的金属声。

“所有这一切交织在一起，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，写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。”卢作孚曾如是回忆道。“卢先生还作了最坏的打算。万一因战事关系，不能按40天的计划完成抢运任务，哪些

东西该抛弃，都要各交运单位作好思想准备，并提醒各交运单位注意：凡运出去的机器设备，必须注意配套，以免运到后方，缺这缺那，成为无用的废铁。”曾参与宜昌大撤退的民生职员周仁贵，被卢作孚的责任感和认真细致打动。

吃了“定心丸”的各单位纷纷着手清理自己的设备和器材，该配套的配套，该装箱的装箱，等待装船起运。而此时，张自忠将军率领的第33集团军，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，几十万出川增援的军队和装备，也急待通过长江航线，奔赴战场。

“每天早晨，必有六七只装满物资的轮船从宜昌开出去；每天下午，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来。三段航运法，充分利用了难得的四十天中水位时间，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运输能力，使成千上万吨至关重要的军工和民用工厂设备从宜昌抢运出去，送到了大后方。”朱复胜介绍道。

让这些交运单位更服气的是，民生公司的“不二价”服务精神。“其他公司商轮，宜昌到重庆要黑市客票价300元，装货每吨要360元，与平时运费不能比。而民生公司客票价仍照平时出售，只卖18元，难童免费，供给膳食。装运货物公物，仍收每吨30元，从不趁火打劫。”项锦熙介绍道。

没有枉费一个钟点

“1938年秋，我在民生宜昌分公司做会计。晚上宜昌分公司办公室灯火通明，卢先生就在这里坐镇指挥，白天他还要处理大量的事务。有时候还要到船上、岸上、码头查看，非常忙碌辛苦。有时，日本飞机在头顶盘旋轰炸或轰鸣而过，情势十分紧张。”民生公司老职员王廷琳回忆道。

1938年11月，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第二次声明，宣称要彻底消灭国民政府，对宜昌实施疯狂轰炸。“我跟着卢先生一起，躲过日军的轰炸。他一点没有惊慌，带着我们踩着弹坑走。”当时负责轮船调运工作的顾烈成回忆道。

“日本人的炮弹太厉害了。我十多岁的时候，跟着小伙伴儿在长江边上玩，捡到了一个西瓜样的铁家伙，一掂量挺沉。我们趴在沙坑里，把它使劲扔到江石堆上，炸了之后，整个石堆被烧得发黑。后来才明白，那铁家伙是日本鬼子投下来没爆的燃烧弹啊！”与共和国同龄的宜昌文史专家陶远震回忆道。

在宜昌撤退的日日夜夜里，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的收发报机一天24小时响个不停，从上游各港口和各轮船发来的电讯日夜不断，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日夜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，紧张地处理着各种电文，所有的电文都要送给卢作孚审阅和批示。

“我父亲作为整个抢运工作的指挥者和组织者，工作尤其忙碌。他对长江上游全线的运输情况了如指掌。他知道每一小时有多少吨物资正在被运走，知道每一只船什么时候航行到什么地方，知道哪些物资正在哪一个港口卸货，知道哪些单位的物资正在装上驳船，从而准确地指挥整个运输工作。”卢国纪说道。

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件非常紧张、非常艰苦、非常细致，并且需要作出非常巨大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工作。“我父亲喜欢在深夜的时候，亲自到江边码头上去检查装货情况，向装卸工人和船员询问各种问题，并就地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。”卢国纪介绍道。

“那时候卢先生已经是交通部次长级的大官员了，但他经常穿便服，下河、上船，查勘货物的装运情况。我看见他穿的便服，就是民生公司下属三峡织厂所产的三峡制服。当时我们民生公司的职工，不论职位高低，每人都有一套。当时在场的搬运工人，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。”

没有停顿一个日子，没有枉费一个钟点，像将军指挥战士打仗，在长江岸边，卢作孚带领着他那佩枪炮的“军队”，在敌人的狂轰乱炸中，用40天时间，将拥塞在宜昌的三万待运人员运走，器材运走三分之二。

又过了20天，当长江水位已经低落到不能大规模运输时，堆积在宜昌两岸的器材都看不见了，剩下的只是一堆无用的零碎废铁。

1938年12月初，江水低落，喧闹的宜昌城完全安静下来。卢作孚独自一人站在宜昌码

头。残阳泣血，黄昏里，日军的炮声轰隆作响，但他并不在意，因为他的使命已完成——这40天的运输量，竟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全年的运量！中国工业的“火种”保住了！未来反攻的有生力量已从这里悄悄转移，在巴蜀之地悄然生长。

我留给子女做事的本领

在西迁的人流中，有从济南流亡的老舍先生。他在《自传》里，也有一篇经宜昌入川的生动记叙：“宜昌城内天天有空袭，在这里等船的人很多，所以很热闹。等了一个星期，民生公司一位黄老翁帮我们买到了票，铺位在甲板上。我们不挑剔地方，只要不叫我们浮着水走就好。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，不要说甲板上，连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……三峡多么值得看，可是看不见，人太多了，若是都拥到船头去观景，船必会插在江里，永远不再抬头。”

旅途是辛苦的，但靠着满腔气节，老舍撑下来了。40天时间下来，卢作孚也是靠着满腔气节，忍着劳累，坚持下来。

“1938年底，父亲回到重庆。我见父亲并没有变多少，仍旧像往日那样神采奕奕，精力充沛，但很明显，他那闪闪发亮的眼睛，遮不住疲惫的暗影，他更瘦了，身体更弱了。”卢国纪原以为父亲回到家，会讲关于武汉和宜昌撤退的惊险消息，可没想到父亲只是略微同伯父母寒暄了几句，就开始与四叔卢子英商谈北碚建设的问题。

“从各个内迁来的科研机构、大中学校复建到工矿企业的筹建情况，谈个没完没了，连吃晚饭的时候，也一边吃，一边谈，一直到深夜。我们觉得和父亲谈话没有指望，都早已上床去睡了。”卢国纪回忆道。

宜昌大撤退，被卢作孚的好友、同是民国乡村建设先驱的晏阳初先生比喻为“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”。《大公报》记者徐盈在他所著的《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》一书中写道：“中国的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，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，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！”

确实如此，40天生死接力结束后，整个艰苦的撤退任务并没有完成。

1939年9月，日寇兵分三路进犯长沙，湖南和广西局势告紧。于是湘桂兵工厂的第1厂、第2厂及第41厂的3万吨器材和兵工署的两千吨器材，紧急撤退到宜昌，由民生公司的轮船抢运到大后方。

1940年上半年，民生公司又从宜昌抢运了1.6万多吨器材到大后方。6月12日，宜昌沦陷后，在接近敌军的平善坝、南沱、三斗坪一带，还有最后一部分兵工器材待运。尽管这几个地方都在西陵峡中，有大山峡谷的天然屏障，但毕竟处于敌人空中袭击的威胁之下，抢运风险极大。

“这时候，我父亲亲自率船前往距敌约20多公里的平善坝，连夜装船，天一亮即运走。民生公司职工们看见他身先士卒，异常感动。大家众志成城，齐心协力，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终将平善坝至三斗坪一带24800余吨兵工器材抢运到上游安全地带。”卢国纪回忆道。

至此，整个撤退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1939年元旦，国民政府向卢作孚颁发一等奖章；同年10月10日，又向卢作孚授予三等采玉勋章。1945年10月10日，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，为卢作孚在抗战期间著有勋绩特颁给胜利勋章。

只是这一枚枚的勋章，卢作孚的孩子们都未曾谋面。卢国纪清楚地记得，1942年夏，他随父亲卢作孚乘车由城里回家。同车还有一位客人，顺路回牛角沱。这位客人一上车就滔滔不绝地夸耀，他如何如何为自己的儿女积蓄财产，让他的儿女将来不愁吃、不愁穿。卢作孚一言不发，一直等客人把话讲完，才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：“我没有给我的儿女准备任何财产。我留给子女的，是做事的本领。”